

# 论《尚书》的新闻传播史料特征及其价值

## ——兼及中国新闻传播史料发展历程<sup>①</sup>

倪延年

(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7)

**摘要:** 文章介绍了《尚书》及其《盘庚》(上中下)的产生、沿革、演进、变化和流传情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尚书》及其《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所具有的新闻传播史料特征属性和学术价值,提出了《尚书》是现存最早的中国新闻传播史料文献,《盘庚》篇则是现存最早的新闻传播史料文献之一的观点。在《尚书》之后,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上古、远古、近古、近代和当代等五个发展阶段。

**关键词:** 《尚书·盘庚》研究; 新闻史料; 中国新闻史料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 G2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8418 (2022) 02-0086-08

根据对有关历史典籍文献和同行学术成果的研读和思考,本文对“儒家五经”之一的《尚书》及其中的《盘庚》(上中下)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新闻传播活动史料”这一问题做一探索。在此基础上勾勒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的发展过程,以求教于海内外同行。

### 一、《尚书》及《盘庚》篇的基本情况

从古代到现在,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的中华民族已生存、繁衍、发展了数千年,为自己和世界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产生、积累、流传给后人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其中有一部分与新闻传播活动直接相关或本身就是新闻传播活动的真实记载,是今人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历史进程及其内在规律的基本遗存,即新闻传播史料。在我们先人生产并流传至今的浩繁卷帙中,被称为“儒家经典之一”<sup>[1]</sup>或“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汇编”<sup>[2]</sup>的《尚书》及其中的《盘庚》(上中下)似乎与新闻传播活动具有密切的联系。

#### (一)《尚书》的产生、流变和主要内容

《尚书》是一部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大致成书于西周后期及春秋战国时期。相传由孔子编选而成。《尚书》在战国时期称为《书》。汉朝始称《尚书》,后因被朝廷确定为“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一,故又称为《书经》。全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起于《尧典》,终于《秦誓》。

《汉志》记载《尚书》原有百篇,孔子在编选后还曾为其作序。该书在秦始皇焚书时被禁并遭“焚

**作者简介:** 倪延年,男,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主持人语:** 史料学是研究史料源流、价值和利用方法的学问,是治史的门径之学,历来为中外史家所重视。特别是在史学领域,无论是西方的客观主义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及年鉴学派,还是中国清代考据学派、近代史料学派,乃至唯物史观学派等,皆将史料视为学科建设的基础,对史料学的研究也较为成熟、系统。相比之下,中国新闻传播史史料学发展明显滞后,尽管新闻传播史著述颇丰,史料的整理也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史料学的建构却仍不完善。搜集整理仅仅是史料学的基础研究,更深层面的学理探索,才是史料学研究的最终目标。鉴于此,本栏目的四篇文章分别从新闻传播史史料的应用及方法论探讨两个层面着力,试图为新闻传播史史料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做最初的努力。

书”之灾。汉初由做过秦朝博士的济南郡人伏生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尚书》29篇并献呈朝廷，时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期的鲁恭王为扩展其邸宅，在孔氏旧宅夹墙中发现了采用秦汉以前通行的大篆写就的《尚书》45篇（据说是孔子后人在秦朝焚书时藏于其中）并献于朝廷，因该书系采用秦汉古文字写就，故称之为《古文尚书》。时人把鲁恭王发现的45篇《古文尚书》和前秦博士伏生呈献的《今文尚书》对比后，得知《古文尚书》中有29篇与《今文尚书》基本相同，同时又比《今文尚书》增加了16篇。据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受皇帝之诏将《古文尚书》用隶书写成“隶固定本”且为之序后献于朝廷，但未能成为官学用书而后失传。东晋元帝时期，豫章内史梅颐（也作“枚𪔐”）向朝廷进献由孔安国作传的《古文尚书》58篇（连书序59篇），其中33篇与《今文尚书》基本相同，《泰誓》3篇则名同而实异，加上多出的22篇共计25篇，被后人称之为“托名孔安国作传和序的‘伪《古文尚书》’”。时至唐朝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降旨命时任国子祭酒、银青光禄大夫、上护军，受封曲阜县公的孔子三十一世孙、唐初经学家、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的孔颖达等撰《五经正义》时，即以梅颐进呈的由孔安国作传并序的“古文《尚书》”为定本，遂成后来通行的《十三经注疏》中《尚书》。李盛铎原藏宋刻本《附释音尚书注疏》30卷，为传世“伪孔传古文《尚书》最早刻本”。鲁同群先生认为：“伪孔传（《古文尚书》）虽系晋人假记，其中尚保留前人旧说，故仍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与伪《古文尚书》合编。因保留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一些重要史料而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献地位。《十三经注疏》本《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组成。其所记内容时间跨度上起公元前23世纪到前22世纪的“尧帝（唐尧帝伊祁放勋，前2357—2258）时期”，下迄西周后期及春秋前期。首为“虞书”，包括《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和《益稷》等共5篇；次为“夏书”，包括《禹贡》《甘誓》《五子之歌》和《胤征》等共4篇；再为“商书”，包括《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和《微子》等共17篇；末为“周书”，包括《泰誓》《牧誓》《武成》《洪范》《旅獒》《金縢》《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等共29篇。

## （二）《尚书·盘庚》产生的起因及通行的原文

现今文献多把《尚书》中的《盘庚》篇记载为《尚书·盘庚》。《尚书》由“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四部分组成，而《盘庚》（上中下）是“商书”中的三篇，因此似乎应记载为《尚书·商书·盘庚》（上中下）才更能清楚地表明《盘庚》在《尚书》中的实际位置。《尚书·商书·盘庚》（上中下）篇记叙了一个完整的重大社会历史事件——盘庚迁殷。《尚书·商书》中的《盘庚》（上中下）篇原文如下<sup>[3]</sup>：

《尚书·商书·盘庚上》：盘庚迁于殷，民不适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曰：“我王来，即爰宅于兹，重我民，无尽刘。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谨天命，兹犹不常宁。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断命，矧曰其克从先王之烈。若颠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绍复先王之大业，底绥四方。”盘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旧服，正法度。曰：“无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告弗知乃所讼！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告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衣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积德！乃不畏戎毒于远迹，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

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憷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沉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迳，其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迟任有言曰：‘有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予告汝于难，若射之有志。汝无侮老成人，无弱孤有幼，各长于厥居，勉出乃力，听予一人之作猷。无有远迳，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

《尚书·商书·盘庚中》：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有众咸造，勿褻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呜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鲜以不浮于天时。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后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汝不谋长以思乃灾，汝诞劝忧。今其有今罔后，汝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无起秽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迁乃心。予迓续乃命于天，予岂汝威，用奉畜汝众。予念我先神后之劳尔先，予丕克羞尔，用怀尔然。失于政，陈于兹，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万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与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罚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劳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则在乃心，我先后绥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断弃汝，不救乃死。兹予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孙！’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剿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尚书·商书·盘庚下》：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今我民用荡析离居，罔有定极。尔谓朕曷震动万民以迁，肆上帝将复我高祖之德，乱越我家。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废厥谋，吊由灵各。非敢违卜，用宏兹贲。呜呼！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尚皆隐哉。予其懋简相尔，念敬我众。朕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 二、“《尚书》为中国现存最早新闻传播史料”辨

据《左传》等记载，《尚书》之前曾出现过《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记载中国上古时期历史事迹的典籍。但《汉书·艺文志》中就已不见著录。文学史学者认为，叙先秦散文当从《尚书》始。新闻史学者认为，《尚书》是“中国最早的记言新闻”，是古代史官记言的辑录；记言形式包括典、谟、训、诰、誓、命等，其中多数都是带有公告性质的帝王讲话；还有一些记录帝王镇压反叛、说服前朝遗民、推行政令的讲话，如《盘庚》《大诰》《多士》《多方》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讲话同样带有强烈的“广而告之”的性质，而史官对这些讲话的记录与传播也同时具有一种新闻宣传的性质。<sup>[4]</sup>现存的《尚书》中传说为商朝遗文的有5篇。其中比较可信为真出商人手笔的是《盘庚》3篇，那是记商王盘庚迁都前后对臣民的三次训话的。<sup>[5]</sup>范文澜先生认为：“《盘庚》三篇是无可怀疑的商朝遗文。”这是本文进一步探讨和思考的基础。

首先，《尚书·商书·盘庚》（上中下）完整记录了一个重大社会新闻——商都“六迁”的第“五

迁”，即盘庚迁殷。史载公元前1766年，后来创建商朝的子天乙起兵逐夏朝第十九任帝桀履癸（桀），立国440年的夏朝遂亡。子天乙己任为帝，建立商王朝，尊号“商汤帝”，建都亳邑（今山东曹县）后，先是在商十一帝子仲丁时（公元前1577年），把国都从亳邑迁至囂邑（今河南荥阳），又在商第十三任帝子河亶甲时（公元前1534年），把国都从囂邑迁到相邑（今河南内黄）；再是在商十四任帝子祖乙时（公元前1525年），把国都从相邑迁至耿邑（今河南温县）；也是在商十四任帝子祖乙时（公元前1517年），又把国都从耿邑迁至邢邑（今河北邢台）。商朝皇帝之所以频频迁都，主要是为了消弭或平缓王族内部经常发生争夺王位的“内乱”以及黄河下游地区屡屡遭受的水灾。从“商汤”建国到公元前1402年盘庚即位，已是商朝的第二十任皇帝。此时距商十四任帝子祖乙公元前1517年自耿邑迁都邢邑又过了近100年。一方面，宫廷王族的争斗愈演愈烈，另一方面，都城邢邑所在的黄河下游地区水灾不断。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盘庚决定并坚定“迁殷”就既不但是一个行政性的决定，更是一个重大社会新闻事件。《尚书·商书·盘庚》的上中下三篇，正好对应了盘庚迁殷的整个过程。《盘庚上》开篇首句为“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盘庚》三篇”。其中的“将”清楚说明《盘庚上》记录的是盘庚已“决定”但还未“实施”迁殷时，就发现“民咨胥怨”并可能影响“迁殷”时向部落首领和臣民训话的内容。《盘庚中》的开篇之句为“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乃化民之弗率，诞告用亶”，其中的“盘庚作，惟涉河以民迁”则清楚说明该篇记录的是盘庚在“作”即实施迁殷、动员部落臣民渡黄河迁往殷邑过程对部落首领和臣民有关训话的内容。《盘庚下》开篇之句“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其“既迁”一词清楚说明该篇记录盘庚完成“迁殷”后对部落首领和臣民的有关训话内容。像《尚书·商书·盘庚》的上中下三篇记载了“盘庚迁殷”这一重大社会新闻事件完整过程的历史文献，毫无疑问具有新闻传播史料的基本特征。

其次，《尚书·商书·盘庚》（上中下）的有关内容和当时新闻传播活动直接相关，甚至本身就是商朝第二十任皇帝盘庚为约束和规范部落首领和臣民意见表达和行为规范做出的明确规定。《尚书·商书·盘庚上》中记载道：王命众，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憺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凡尔众，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大意是：“你们站整齐了，我现在就把有些事给你们明说了吧！我要想办法使你们死了那条心，老老实实地跟随我到安康之处。假如你们不按照我的要求，用美好的语言去动员老百姓和我一道迁移，那你们将是自作自受。你们做的那种事情迟早要败露并受到追究，到那时祸害也就将降临到你们身上了。你们在前面做了有害于民的坏事，使自己整天担惊受怕，到那时你们后悔还来得及吗？不该讲话的时候最好把嘴闭起来，假如多嘴多舌而失言，到那时你们的生死就由我决定了。你们不要以为背着我向老百姓散布流言，我会不知道，难道你们真能躲在老百姓中间不被我发现吗？我已经讲了不少了，老实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只有老老实实地管好自己的事，管好你们属下的老百姓，说话时注意分寸，否则的话，处罚就会降临到你们头上，到那时你们可不要后悔哟！”<sup>[6]</sup>《尚书·商书·盘庚》（中）记载：“呜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无胥绝远！汝分猷念以相从，各设中于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颠越不恭，暂遇奸宄，我乃剿殄灭之，无遗育，无俾易种于兹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顾颉刚先生将该段古文翻译为：“唉，现在我的计划决定了！你们对于我所忧虑的事情，应当体会，不可漠视了！你们应该各各把自己的心放得中正，跟了我一同打算！倘有不道德的人乱作胡为，不肯恭奉上命，以及作歹为非、劫夺行路的，我就要把他们杀戮了，绝灭了，不使得他们恶劣的种子遗留一个在这个新邑之内。去罢，去寻找安乐的生活罢。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希望永久安定你们的家。”<sup>[7]</sup>《尚书·商书·盘庚》（下）记载：“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



怒，协比谗言予一人。’”这段古文翻译为：“盘庚迁民于新邑之后，首先安定他们的住地，其次辨正宗庙朝廷的方位，然后告诉大家说：‘不要玩乐和怠惰，要努力完成重建家园的大业。现在我要披肝沥胆，把我的意见全都告诉你们。我没有惩罚你们，希望你们不要心怀不满，互相勾结在一起，说我的坏话。’”<sup>[3] (119)</sup> 有学者认为，在《尚书·盘庚》这篇长篇大论的重要文献中，详细地追述了当年商王盘庚在迁都时对臣属发布的告谕，其中宣称商王掌握着对臣属的生杀大权，将对任何反对迁都、为非作歹的臣民施以严厉惩罚，迁都的整个过程体现出商王盘庚的优越地位和主导作用。<sup>[8]</sup> 前所引《尚书·商书·盘庚》（上）的文字是商王盘庚直接约束和规制部落首领和臣民意见表达的，而引自《尚书·商书·盘庚》（中）的文字是商王盘庚直接规范部落首领和臣民行为的。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传播“盘庚迁殷”中的有关新闻信息，因而具有新闻传播史料的实际功能和史料价值。

再则，《尚书·商书·盘庚》篇的新闻史料价值已得到学术界认可。复旦大学的黄瑚把《尚书·盘庚》有关内容作为新闻法制史料引用，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在法律上不仅把一切侵犯君主专制统治的行为宣布为非法，而且还实行以言论、思想、文字论罪的文化专制制度，制订了无数箝制与镇压言论、出版的法律规定。最早出现的“言禁”法令即以思想、言论论罪的有关法律、法令的规定，见诸史料的第一个“言禁”法令，可能产生于公元前 14 世纪的盘庚迁殷时代。<sup>[9]</sup> 学者孙旭培认为，早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言禁”法令，当时国王盘庚决定将国都迁到一个叫“殷”的地方，人们议论纷纷。盘庚下令“自今至于后日，各恭尔事，齐乃位，度乃口，罚及尔身，弗可悔”，禁止一切非议。<sup>[10]</sup> 赵振祥认为，《盘庚》三篇都是盘庚就迁都一事对“众”和“民”所发布的谈话与命令。上篇是盘庚对执政者的谈话，也就是奴隶主阶层，盘庚虽然对他们贪图安逸不愿迁都的行为严加训斥，但总体来说还是一种规劝的口吻。中篇谈话的对象是“民”，盘庚把他们叫做“畜民万民”，把他们当做牲畜一样看待，这些“民”显然是奴隶阶层，因而盘庚的谈话便声色俱厉。<sup>[4] (45)</sup> 笔者的《中国新闻法制史》<sup>[11]</sup> 和《中国新闻法制通史：古代卷》<sup>[12]</sup> 也前后引用了《尚书·盘庚上》有关史料，作为中国新闻法制史上第一个“言禁”法令予以解读和阐释。《尚书·商书·盘庚》有关内容被新闻断代史（如《唐前新闻传播史论》）、新闻专题史（如《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及新闻专题通史（如《中国新闻法制通史》）著作屡屡引用。因此《尚书·商书·盘庚》篇具有新闻传播史料的基本属性和学术功能。

由于《尚书·商书·盘庚》（上中下）具有新闻传播史料的特征和功能，因此《尚书·商书·盘庚》（上中下）属于新闻传播史料。既然《盘庚》所在《尚书》为目前传世最早的中国历史典籍，那么《尚书》及其《盘庚》（上中下）就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新闻传播史料。

### 三、《尚书》后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的发展历程

《尚书》出现之后，中华民族先人在数千年新闻传播活动中继续产生汗牛充栋的“海量”新闻传播文献史料。综观这一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一）上古时期

这一阶段应该开始于《尚书》产生之前。大致从人类社会产生记载与新闻性消息传播活动的相关文献史料开始，到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结束及至中国出现大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王朝（秦朝）为止。在没有文字记录前，先人关于新闻性消息传播活动的有关“记忆”是通过“口耳相传”途径，以“神话传说”形式被后人获知和记忆并再传给后人。所以，中国先人对社会重大新闻事件的记忆、散播和流传大多是以神话传说故事为主要形式流传下来，再被后人记载进历史典籍。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书写文字尚不统一，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的“书同文”政策，在秦国通用文字基础上略加改造后，成为“秦篆”并推行到全国。文字统一需要时间，加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所以现今流传下来的历史典籍主要是秦朝以后发现甚至是汉朝产生的。如《尚书》就是产生于秦前，在秦后得以见天日。《尚

书》之后如《山海经》，传世版本共计18卷，包括《山经》5卷，《海经》13卷。后人考证其中14卷为战国时作品，4卷为西汉初年作品。西汉初年，司马迁编撰《史记》中记录有不少神话传说故事，西晋时发现《穆天子传》（又称《周王传》《穆王传》《周穆王传》及《周穆王游行记》等）和东晋人干宝所撰《搜神记》等都记载了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应是作者通过深入当时生活获知这些神话传说故事记载下来的。这些著作中记录有神话传说故事，并不说明在这些著作问世时仍然产生神话传说，而只是说明先人流传的神话传说到那个时候才被人获知后得以记载。有人认为，《山海经》《搜神记》中记载的神话传说故事是当时我们先人对最大社会新闻事件的记忆并口耳相传的结果，而《穆天子传》则是重大朝政新闻事件的最早记载。<sup>[4] (31)</sup>

## （二）中古时期

这一阶段大致从中国出现第一个大一统封建君主专制的秦朝、中国社会进入以自给自足农业经济为主要特征的封建社会开始，到中国由封建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嬗变的鸦片战争爆发的1840年为止，前后约2000年左右。这一阶段的新闻传播史料最重要也是最本质的发展，就是产生了以通用语言文字（俗称“中文”）记载的文献史料。汉朝是一个统一、稳定和巩固的封建君主王朝。皇帝准许郡（省级行政长官公署）和同姓或异姓王的封国在京师设“郡国邸”以履行“通奏报待朝宿”的职能，戈公振认为通奏报云者，传达君臣间消息之谓，即“邸报”之所由起也。<sup>[13]</sup>唐代宗大历年间把“邸”改为“进奏院”，现收藏于英国不列颠图书馆和法国国会图书馆的两件书写品，方汉奇先生考证确定是唐代的“进奏院状报”已无争议。<sup>[14]</sup>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对进奏院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后出现了由朝廷命官直接控制的真正代表朝廷的朝廷官报“进奏院状报”。<sup>[15]</sup>有学者认为，可以得出元代有以“除目”形式存在的（元朝）官报之结论，其性质是官僚系统内部参考性质的中央政府公报，其内容为官员升陟罢黜等情况。<sup>[16]</sup>明代朝廷官报不光有文献记载，且有“天变邸抄”等作为旁证。从朝廷六部抄传给京师官员者称为“朝报”，传播到京师以外地区的称为“邸报”。<sup>[17]</sup>清朝依旧如故，只是由朝廷通过官办提塘从京师寄向全国，直到清末。中国古代民间报刊甚至可说是先有民间报纸，后有官办报刊。南宋时期，周麟之在给皇帝“进言”时使用的“小报”成为后世对非法民间报纸的统称，元朝称为“小本”，直到清朝前期仍然存在，顺治年间甚至半公开合法存在，经过顺康雍乾四朝严刑峻法才销声匿迹。由朝廷官报“京报”弥散开来的《京报》一直到辛亥革命后。除朝廷官报和民间报纸外，这一阶段新闻传播史料还包括：历朝各代编纂的朝廷正史、民间野史、官刻书籍、私撰著作、私刻书籍、宫廷档案（圣旨、上谕、廷寄、奏摺、臣僚（进）言、皇帝起居注、各朝实录等）及早期外国人在华创办的近代报刊（如《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之类）等。

## （三）近古时期

这一阶段大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开始，到孙中山领导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止。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国的运行轨迹，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向英国割让中国领土香港本岛、中国关税须和英国人“商妥”才能“变更”及英国传教士可在中国自由传教等，使中国的国家主权受到实质性的伤害，中国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和中国古代传统新闻传播史料相比，近古时期新闻传播史料的最大变化就是随着外国传教士把诞生于西方的“新式报章”带进中国，中国进而在新闻事业近代化过程中产生的新闻史研究史料。首先是记载外国传教士及其新闻活动的文献史料：外国传教士与新闻传播活动相关的人生阅历史料、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办报形成的史料及外国传教士所办报刊对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产生影响及政府（官员或官署）与外国传教士互动的史料文献；其次是中国政治新闻人创办近代报刊活动的文献史料，如维新派、保皇派及预备立宪派创办具有资产阶级团体政党机关报过程的文献史料、创办的政论报刊原始文献、与创办报刊有关的人生阅历文献记载（日记、书信、谈话、著作等），以及所办报刊与当时政府及社会生活互动的文献史料等；再则是记载资产阶级革命派人士在从事反清革命斗争过程中创办具有资产阶级团体政党机关报过程的文献史料、创办的政论报刊原始文献；

与创办报刊有关的人生阅历文献记载（日记、书信、谈话、著作等）及所办报刊与当时政府及社会生活互动的文献史料等；最后是外国报业资本家在中国创办新闻报刊形成的文献史料。外国报业资本家在中国创办新闻报刊活动的直接目的既不是代表“万能”的耶稣来中国“拯救上帝的羔羊”，也不是为了向中国人传播西方工业革命后出现的近代科学技术知识，而是作为一种投资行为经营谋利（最有代表性的是在上海创办《申报》的英商美查及后来的《新闻报》老板美商福开森等）。他们出版发行的原始报刊文献及这些报刊与当时中国政府、当时中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文献史料，也是研究近古时期中国新闻史的基本史料。另外，清末在《官书局报》和《官书局译报》以及《北洋官报》带动下，朝廷所办近代化官报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文献史料，对于全面客观研究这一阶段的中国新闻史，仍是不应忽视和不可替代的基本史料。除了传统民间报刊、外国人在华创办的近代报刊（各种外国文字的报刊和采用中国文字出版的报刊）、国人创办的近代新闻报刊（汉语报刊和少数民族文字报刊）、国人创办的近代政论报刊、国人在海外创办的新闻报刊以外，历朝各代编纂的朝廷正史、民间野史、地方史志、官刻书籍、私撰著作、私刻书籍、朝廷官报、宫廷档案（圣旨、上谕、廷寄、奏摺、官报及起居注、实录等）也是应当重视的基本史料。

#### （四）近代阶段

这一阶段从孙中山在南京领导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民族各阶层人民在北京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止。这一阶段的中国新闻事业的最重要发展是诞生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经历了大革命运动、十年国共内战、八年国共合作抗日、三年国共两党对决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已建立起由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国家新闻通讯社新华通讯社及基本覆盖全国大陆地区的各级党报网络，形成了数量巨大、历时数十年、类型多样的文献史料。与此相对应的是孙中山在清末时期创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在进入“中华民国”后先改组成为“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在日本重组为“中华革命党”，1924年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定名为“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和汪精卫等国民党新军阀先后制造上海“四·一二”、武汉“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导致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失败，国共两党形成势不两立对峙局面。即使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时期，国民党也没有完全停止制造两党及军队摩擦。抗战胜利后，以“和平建国”为目标的国共和谈很快失败，两党军队三年对决，国民党溃败到台澎金马东南沿海岛屿。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存在的几十年间，中国国民党新闻事业形成并留下数量巨大、内容丰富、类型繁杂的文献史料。因此，国共两党新闻事业文献史料（包括原始新闻报刊、新闻报人、新闻事件、新闻媒介、新闻法制及政府档案）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史料的主体。除此以外还有内容丰富的民营新闻业史料、其他政党新闻业史料及外国在华新闻人的新闻活动史料。随着新闻技术和机械的发展和普及，新闻电影（电影拷贝和胶片、新闻电影摄制机构、新闻电影的摄制者及相关文献史料、新闻电影的相关文献史料等）、新闻照片（新闻人物、事件、器物及现场的照片，新闻摄影家的相关文献史料、新闻摄影作品产生过程的文献、新闻摄影机构或团体的有关文献史料等）、新闻广播（广播电台建设的文献史料、新闻广播播音员的文献史料、新闻广播事件的有关文献史料以及新闻广播稿、新闻节目表、新闻节目海报等）。

#### （五）当代阶段

这一阶段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开始，至今延续。这一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史料具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是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蒋介石国民党集团在国共内战失败后退居到东南沿海的台澎金马诸岛，中国暂时没有统一；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因清廷与英、葡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条约，分别直到1997年和2000年中国恢复行使主权，所以中国新闻传播史料形成“一国四地区”分布格局；祖国大陆、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产生的新闻传播史料各具特点。其次是自20世纪40年代末到目前（21世纪20年代），社会进步

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新闻业发展进入“快车道”，新的新闻媒介如电视新闻媒介、互联网新闻媒介、智能手机新闻媒介以及依托互联网媒介产生的诸如抖音、移动电视、IPTV等在较短时间里不断推出更新，产生出“海量”的“五彩缤纷”的新闻传播史料文献，并呈现出多类型、多载体、多形态的特点。最后是政府及学术界对传统纸质文献整理、重印、出版尤其是数字化出版的重视，学界集中力量整理、政府提供资助完成的历史文献整理重印工程成效明显。包括：珍贵、重要的历史报刊重印出版（《解放日报》《新青年》《红色中华》《新中华》《人民日报》以及《临时政府公报》《临时公报》和《申报》等）。民国时期原始史料汇编出版，最重要的是由方汉奇主编，程曼丽、王润泽、郭传芹等作为副主编的《民国时期新闻史料汇编》，已出版至第四编，“为研究民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学者，特别是研究新闻史的学者们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 四、小 结

无论是探寻中国现存最早的新闻传播史料文献，还是勾勒中国新闻传播史料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都是十分复杂的学术问题，需在尽可能全面、系统、完整的文献史料基础上精细地研读、缜密地思考和严谨地表述。本文只是对该问题的初步探讨和思考，笔者因撰文时间仓促，尤其是学术积累不足，文中可能有片面、主观之言，请同行专家不吝赐教。

### 参考文献：

- [1] 辞海编辑委员会. 辞海：第六版缩印本 [M].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1640.
- [2] 赵国璋，潘树广主编. 文献学词典 [M]. 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507.
- [3] 王世舜，王翠叶译注.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尚书 [M]. 北京：中华书局，2012：100-122.
- [4] 赵振祥. 唐前新闻传播史论 [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44.
- [5] 张荫麟. 中国史纲 [M].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9.
- [6] 倪延年. 中国报刊法制发展史：古代卷 [M]. 江苏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63-64.
- [7] 顾颉刚. 古史辨（第二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8-59.
- [8] 叶孝信. 中国法制史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11.
- [9] 黄瑚. 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论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14.
- [10] 孙旭培. 新闻传播法学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49.
- [11] 倪延年. 中国新闻法制史 [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5.
- [12] 倪延年. 中国新闻法制通史：第一卷：古代卷 [M].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71.
- [13]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22.
- [14] 方汉奇.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53-60.
- [15] 朱传誉. 宋代新闻史 [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14.
- [16] 李漫. 元代传播考：概貌、问题及限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1.
- [17] 尹韵公. 中国明代新闻传播史 [M].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27.

[责任编辑：高辛凡]